

国研·书院

关于中国经济增长、
城市化和城乡区域发展的实证分析

尝试回答增长状况怎样，为什么，
未来会怎样的问题

关于城市规模和城市群的分析与思考

THE ROAD AHEAD: CHINA'S ECONOMIC CHOICES

中国：增长与发展的 路径选择

王小鲁◎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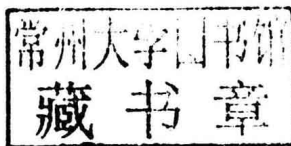


中国发展出版社
CHINA DEVELOPMENT PRESS

THE
ROAD AHEAD:
CHINA'S ECONOMIC
CHOICES

中国：增长与发展的 路径选择

王小鲁◎著



中国发展出版社
CHINA DEVELOPMENT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增长与发展的路径选择/王小鲁著. —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18. 6

ISBN 978 - 7 - 5177 - 0807 - 0

I. ①中… II. ①王… III. ①中国经济—经济增长—文集
IV. ①F124. 1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83990 号

书 名：中国：增长与发展的路径选择

著作责任者：王小鲁

出版发行：中国发展出版社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16 号 8 层 100037)

标准书号：ISBN 978 - 7 - 5177 - 0807 - 0

经 销 者：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者：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20mm × 960mm 1/16

印 张：23

字 数：350 千字

版 次：2018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201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68.00 元

联系电话：(010) 68990646 67899620

购书热线：(010) 68990682 68990686

网络订购：<http://zgfcbs.tmall.com>

网购电话：(010) 68990639 88333349

本社网址：<http://www.developress.com.cn>

电子邮件：cheerfulreading@sina.com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本社图书若有缺页、倒页，请向发行部调换

自序

Preface

这本书集中体现了我对于中国经济增长、城市化、城乡与区域发展的分析与思考，收录了作者过去 18 年在这些方面的研究成果共 12 篇。

一个 13 亿人口的大国持续三十多年高速增长，是一个直接改变十几亿人生活，也改变了世界面貌的宏大事件。作者有幸作为一个学者跟踪了这个过程并做了一些研究。由于研究对象的庞大、复杂和个人能力的渺小，这些研究可能如盲人摸象，挂一漏万，或有各种偏颇。不过我一直秉持的态度是力图做到客观和严谨，不为哗众取宠或歌功颂德，不先入为主地用自己的观点或偏好去塑造研究结果；而是老老实实在地研究客观对象，尝试回答研究对象“是什么”，“为什么”，“会怎样”的问题。这些研究中不准确或错误的地方，留待事实检验。

在经济增长的航程中，有长驱直入，也有曲折迂回、逆流暗礁。我更在意的是发现哪里有逆流、哪里有暗礁，希望能够发出警示，让航船继续顺利前行。至于这些分析和警示是杞人忧天，还是言之有据，有待世人和历史去判断，我本人也会继续寻找答案。

在我国的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城市、乡村和不同区域的发展都特别值得关注。农村工业化在改革初期对推进经济增长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随后大部分时间里城市化扮演了火车头的角色。城市化对增长的作用、城市的规模优化等问题特别需要深入研究，这些鲜活而宏大的经济现象也为

世界范围的经济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营养。中国多数省份的人口规模堪比欧洲主要国家，区域发展的动因和格局关系重大。本书中的后 6 篇文章在这些方面进行了一些独立的学术探索，希望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这本书里收录的文章，除纠正了极个别文字、标点及原文发表时的排印错误外，内容完全遵循原貌。我只在两篇作者手记和几条脚注里加了某些事后评价。

经济增长篇

作者手记 / 2

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 5

一、要素投入与经济增长 / 7

二、制度变革：增长的动力与阻力 / 21

三、结构变动：农村工业化，城市化，产业科技化 / 31

四、宏观环境：国际经济，宏观政策，社会稳定 / 43

五、增长综述：过去 20 年和未来 20 年 / 53

附录 / 64

对中国经济增长统计数据可信度的估计 / 77

一、文献回顾 / 78

二、GDP 增长率、各地区经济增长率和价格指数变化 / 80

三、用工业产品产量计算工业增长率 / 82

四、从货物周转量和工业电力消费量估计工业增长率 / 84

五、对工业增长率的生产函数分析 / 86

六、对服务业和 GDP 增长率的生产函数分析 / 90

七、结论 / 95

关于中国经济增长率的几点讨论 / 98

一、中国在经济改革期间是否经历了高速经济增长 / 99

二、我国经济增长统计的准确性如何? / 101

三、对几篇文章的几点评论——兼答任若恩 / 107

四、几点概括 / 113

中国市场化进程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 115

一、引言 / 115

二、文献回顾 / 116

三、模型和数据 / 120

四、回归结果与分析 / 127

五、结论 / 132

关于固定资产投资和固定资本形成规模的验证 / 137

一、背景情况 / 137

二、以构成法重新推算固定资产投资和固定资本形成 / 143

三、从资金来源推算固定资产投资规模 / 154

四、结论 / 161

结构调整与中国经济增长前景 / 166

一、引言 / 166

二、经济增长的供给侧影响因素：模型分析 / 168

三、经济增长的需求侧讨论 / 172

四、经济增长预测：2020 ~ 2030 年 / 177

五、结论 / 184

附录 数据、模型说明和计量分析结果 / 185

城乡区域发展篇

作者手记 / 192

农村工业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 195

一、改革期间的农村工业化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火车头 / 196

二、制度变革引起的劳动力和其他资源再配置是非农产业增长的主要动因——模型分析 / 197

三、对农业和乡镇企业资本积累和转移的计算 / 204

四、农村工业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制度变革、生产率提高、要素增长 / 208

五、农村工业化还能继续带动经济高速增长吗 / 210

六、从农村工业化到城市化：关于中国农村工业化发展道路的讨论 / 215

城市化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 222

一、城市化的理论、历史与现状 / 223

二、导致城市化滞后的主要制约因素 / 232

三、城市规模优化模型 / 236

四、城市规模收益的数量分析 / 239

五、政策选择：大城市与小城镇 / 245

六、城市化与经济增长 / 248

七、加速城市化建设的若干政策考虑 / 252

附录 关于城市规模收益和外部成本的计量分析 / 255

农村工业化和城市化在区域发展中的作用 / 261

一、对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和收入差距的回顾 / 261

二、农村工业化、城市化和地区发展 / 264

三、结论与政策含义 / 271

中国地区差距：20 年变化趋势和影响因素的总体分析 / 273

一、20 年间地区经济差距的变化和研究地区差距的理论框架 / 274

二、地区间的资本流动和外资的地区分布 / 278

三、地区间的劳动力流动 / 292

四、人力资本的地区分布 / 298

五、各地区市场化程度的差异 / 302

六、城市化和农村工业化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 / 304

七、区域间比较优势的转移 / 308

八、主要结论 / 314

中国城市化路径与城市规模的经济学分析 / 319

一、中国城市化的历史经验教训：大与小 / 320

二、关于城市规模和布局的经济学思考 / 323

三、关于城市规模的实证分析：国际经验 / 330

四、结论 / 338

对中国城乡就业和城市化率的再估计 / 342

一、引言 / 342

二、关于中国城市化现状的困惑 / 343

三、统计数据对城镇流动人口和就业人员的遗漏 / 346

四、对城乡就业人数和人口的重新估算 / 352

五、城市化发展的未来趋势 / 355

六、结论 / 357

中國

经济增长篇

作者手记

如果将 7% 以上的年度经济增长定义为高速增长，中国经济自改革开放（1978 年）以来到 2014 年为止，经历了 37 年高速增长。这期间年均增长率 9.8%，只有 3 年增长率低于 7%。这一增长业绩是如何实现的？哪些因素促成了中国经济的长期高速增长？哪些因素对经济增长有负面影响，并可能在未来阻碍经济增长？未来的增长趋势如何？怎样继续保持合理和可持续的经济增长？这些问题需要经济学研究者做出正面回答。本篇收录了作者（及合作者）自 2000 年至 2017 年发表和未发表的关于中国经济增长的论文和研究报告 6 篇。这些论文和报告旨在回答上述关于增长的贡献因素和影响因素，以及未来增长趋势和保持增长需要采取的改革措施与政策调整等问题。

在因素分析方面，这些论文的共同特点是，除了考察要素贡献以外，还重点分析制度、政策、结构变迁等因素对增长的作用。

在 2000 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报告中，作者通过模型分析证明改革期间市场导向的非国有经济发展、初期的农村工业化和后来的城市化、对外开放都带来了要素配置效率改善，促进了经济增长和生产率提高。同时指出，国企改革缓慢、政府过度干预经济、吏治和司法腐败、收入差距过大、宏观政策欠稳健等因素对经济增长有负面影响。今天看来，上述各因素仍然是对经济增长有积极和消极影响的重要因素，因此可以说当时这些分析仍然是站得住脚的，并基本上依旧适用。当然随着情况变化，对影响经济增长各因素的认识，也需要继续深化。

在该报告中，作者预测未来的中长期经济增长率将下降到 6.6% 左右，但

预期在 2000 ~ 2010 年期间就将发生,事实证明是不准确的。原因在于:第一,2000 年以后储蓄率和资本形成率未依常规情形逐步下降,反而在政策刺激(包括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和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推动下持续大幅上升,这一方面拉高了短、中期经济增长率,但也带来了日益严重的结构失衡;第二,作者未充分预见到我国加入 WTO 后一个时期出口大幅超常增长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强劲带动;第三,该预测对经济增长率因地方虚报导致的“水分”打了折扣(见该文第五部分和《对中国经济增长统计数据可信度的估计》),但未预见到同时存在的统计漏报和后来的统计修订。2004 年经济普查后,国家统计局将 GDP 总量调高了约 17%,并相应修改了经济增长率。因此作者当年对数据的修订和未来预测偏于保守;由此导致的偏差,留待读者批评。

在 2016 年的《结构调整与中国经济增长前景》中,作者使用改进的模型和新的数据对中国经济增长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解并预测了未来的增长趋势。该研究发现外资和外贸对增长的促进效应已趋于衰减,城市化通过改善资源配置对生产率提高做了最重要的贡献,市场化进展在继续发挥促进生产率提高的作用。但同时也发现资本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一个时期以来显著下降,按规模收益不变条件计算的全要素生产率近年来已由正转负。主要影响因素有:第一,行政管理成本过高及对市场的干预增加;第二,消费率过低,储蓄率和投资率过高;第三,债务杠杆率大幅提高,这些因素导致了严重的效率损失。基于上述分析,该文预测在常规情景下未来到 2030 年的长期增长率会降到 6% 以下,如不控制杠杆率的快速上升,还可能导致巨大的金融风险乃至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而如果能加快改革降低政府管理成本、促进消费率回升,并切实实现中性货币政策和去杠杆,则仍有可能经几年调整后恢复 7% 以上的增长率,到 2030 年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这些分析和预测,还有待未来事实的验证。

需要补充指出,上述研究在模型方法上有所缺欠,即没有对模型的协整问题进行检查和修正。作者后来在另一篇尚未发表的文章中对此做了补正,用改进的差分模型方法对全要素生产率进行重新分解。增长核算和预测结果与上述 2016 年论文的结果很接近,说明以前的分析结果并无明显的技术偏差。

在 2011 年发表的《中国市场化进程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一文中，本作者与两位合作者还共同将国民经济研究所的“中国分省市场化指数”带入面板数据增长模型，专门就市场化改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进行检验，证明市场化对增长确有显著而重要的贡献，且贡献值明显大于用时间序列模型得到的结果。这是因为在时间序列模型中，我们只能用非国有企业在工业中的比重变化作为一个近似变量来反映市场化进程，而“市场化指数”则更全面地反映了市场化各方面的进展。

研究经济增长，一个关键条件是需要准确的数据。某些统计数据受到条件限制欠准确，给研究带来了一些困难。本篇除包括了孟连、王小鲁 2000 年关于增长统计数据可信度的研究报告外，还包括了作者 2015 年的研究报告（未公开发表）：《关于固定资产投资和固定资本形成规模的验证》。一个时期以来，固定资产投资统计与固定资本形成统计之间的背离越来越大，使研究经济增长的学者面临困扰。对此还未看到学术界做出正式反应。投资和资本形成数据是计算资本存量的基础，对增长分析至关重要，需要认真研究。在该报告中，作者对上述背离现象做出了解释并提供了自己的计算。这仅是一个初步的研究，计算是否准确有待验证，仅供读者参考。

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①

——跨世纪的回顾与展望

■ 王小鲁

自1978年经济改革开始至今，中国已经经历了超过2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统计数据显示，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均增长率从改革前（1953～1978年）的6.1%提高到改革期间（1978～1999年）的9.6%。人均GDP增长率由改革前的4.0%提高到改革期间的7.7%或8.2%（据国家统计局，1999、2000；世界银行，1996、1997a计算）。

尽管对已公布的经济增长率是否准确有一些争论（见本文第5部分第1节），尽管最近几年经济遇到了某些短期困难，但改革期间经济增长明显加快、多数中国人生活水平大幅度改善，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并且得到了国内外经济学界广泛的承认和肯定。是什么导致了经济增长的加速？这种高速增长是如某

① 本报告是为国民经济研究所《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与制度变革》研究课题撰写的总报告，载于王小鲁、樊纲编：《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跨世纪的回顾与展望》，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摘要稿发表于《经济研究》2000年第7期。该课题由王小鲁、樊纲负责，课题组成员有：樊纲、蔡昉、杜方利、贺力平、黄晓京、孟连、王小鲁、武剑、夏小林、张晓晶、周天勇。本报告是在上述成员撰写的14篇分报告和背景报告（见正文后的参考文献）的基础上形成的，吸收了他们的主要研究结论，因此是一个集体成果。但本报告中的错误疏漏主要由本作者负责。此外，余永定、易纲、张春霖、张曙光、陈锡文、卢迈、温铁军、米建国、刘世锦、石小敏、海闻、郑京平、盛洪、张军扩等许多学者曾参加过总报告和各分报告的讨论并提出过宝贵意见和建议。乔桐封、朱赛霓、李爱莉为研究课题做了大量工作。肖梦对总报告提出过文字修改意见。都阳担负了其中某些数据的准备和分析工作。作者对上述参与者的贡献表示由衷的感谢。

些外国经济学家所说，仅仅是由投入增长带动的短期现象，还是可持续的长期趋势^①？本报告旨在评价改革 20 年来经济增长的整体状况，分析高速增长的主要原因，判断这些因素的剩余潜力，并研究今后可能制约经济增长的内部和外部因素，从而对中国在进入 21 世纪后的 20 年中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可能性提供一个展望。

本报告对过去 20 年经济增长的基本评价可概述如下：

(1) 改革期间由储蓄率提高引起的国内投资增长加速，以及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外资投入大量增加对经济增长的加速起了重要作用。但市场化改革带来的效率提高（包括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也包括投资效率的提高）所起的作用更为重要。因此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不能简单归结为“投入带动型的增长”。

(2) 过去 20 年间引起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主要因素是制度变革带来的大规模生产要素重新配置，特别重要的是农村劳动力和其他资源从农业向乡镇企业和城市第二、第三产业的转移和非国有经济的迅速发展。

(3) 对外开放带来的外资投入和对外贸易迅速增长，和国内企业由于市场竞争引起的效率提高、激励增强也对技术进步和生产率增长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技术进步还没有成为生产率提高的主要动力。因此，已经发生的经济高速增长主要还是外延型的增长。

(4) 经过 20 年的高速增长，短缺已经消除，需求结构正在发生重要的变化。外延型经济增长的动力正在减弱。一些尚未解决的体制缺陷越来越成为继续增长的严重障碍。当前经济增长面临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重大挑战。

但以上局面并不必然意味着高速增长의 终结。我国经济仍然有巨大增长潜力，在今后 20 年中仍可能保持显著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增长速度，从而继续缩小与发达国家间的差距。但要保证今后经济持续增长必须着重解决以下几个方面问题：

^① 见 Solow (1956), Lucas (1988), Romer (1986) 关于增长理论的文献，以及世界银行 (1993), Krugman (1994) 和 Martellaro (1996) 关于东亚和中国经济增长的争论。

(1) 我国城市化进程严重滞后,特别是适度规模的大中型城市不足。今后通过调整城市化政策以加速城市化建设,促进农村人口和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将会有效改善资源配置状况,成为今后 20 年经济增长的一个主要动力。

(2) 加速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调整,使生产率增长逐渐转移到以技术进步为主要动力的轨道上来。20 年来的市场化改革已经使这种转化具备了可能性。目前需要完善市场规则,建立健全对产权和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改革金融体制,培养风险投资机制,改善中小企业融资状况,以形成技术创新的内在动力和制度保障。

(3) 政府机构和人员的臃肿、腐败、不公正执法形成了对经济增长的严重阻碍。迫切需要改革和精简机构,打击腐败,强化公众监督,改善政府对市场和公众的服务,减少妨碍市场竞争的行政干预,形成透明、高效、保护公平竞争的法制环境和较合理的收入分配体系。

今后 20 年,由要素带动的经济增长率可能只能保持在接近 4% 的水平,经济增长率的高低将主要取决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而上述几个方面问题的解决将有力推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这几个目标如果能顺利实现,将有可能使我国经济在今后 20 年内继续以平均超过 6% 的不含水分的真实速度增长(可能达到 6.4%)。这样,到 2020 年人均 GDP(按 1999 年汇率计)将达到目前的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中国将告别贫困(该计算未考虑汇率变动和中外通胀率差异的因素——作者注)。

一、要素投入与经济增长

(一) 国内储蓄与投资

1. 高储蓄和高投资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改革期间,随着储蓄率的提高和市场导向的投资机制变化,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由 1953 ~ 1978 年的 6.2% 上升到 1979 ~ 1998 年的 11.8% (均已折算为

不变价格)。资本形成明显加速。

根据作者的计算，以不变价格计算的净资本存量（即按实际交付使用的固定资产净值计算的资本存量）增长率在改革以前 26 年间（1953 ~ 1978 年）平均约为 5.1%，而在改革 21 年间（1979 ~ 1999 年）上升到平均 10.2%。这对经济增长无疑发挥了强有力的带动作用。我国的净固定资本存量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 1952 年估计只有 1600 亿元，到改革开始的 1978 年增长到 5840 亿元，而到 1999 年则增长到 45100 亿元（均按 1952 年价格计算）。根据模型分析的结果，按照资本弹性为 0.5 计算，改革期间的物质资本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由 2.6 个提高到 5.1 个百分点，加速了约 2.5 个百分点（详见第 5 部分和附录 2）。

改革期间的资本形成之所以加速，除消除了“大跃进”和“文革”的消极影响以外，一个重要原因是国内储蓄率的持续上升。从图 1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如果排除 20 世纪 50 年代末期到 60 年代的大起大落，国内储蓄率呈持续上升的趋势，在改革前从 1952 年的 22% 持续上升到 70 年代的 34% ~ 35%，于 1978 年突破了 38%，并在改革期间大体保持了这个水平，在 1992 ~ 1998 年则进一步上升到 38% ~ 43%。图 1 还显示了国内储蓄率和国内固定资产投资率、国内固定资本形成率的相关关系，说明改革 20 年来居高不下的国内储蓄率保证了该期间的高投资和高资本形成。

导致储蓄率上升的一个主要因素是居民收入绝对水平的提高。改革以来，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按可比价格计算提高了 2 ~ 3 倍，同时城镇居民储蓄率也由 8.9% 上升到 20.2%（1985 ~ 1998 年），农村居民储蓄率由 13.4% 上升到 26.5%（1978 ~ 1998 年）。这说明城乡居民的边际储蓄倾向是递增的（国家统计局 1998，1999；另见贺力平 1999a）。近年来居民预期收入的不确定性是导致高储蓄、低消费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武剑，1999）。

居民储蓄的增长集中体现在居民银行存款的增加。1980 ~ 1998 年，全部银行存款从区区 1600 亿直线上升到 9.5 万亿，其中居民储蓄所占比重从 17% 上升到了 56%，已成为银行资金的主要来源。目前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银行资金已取代了政府财政预算的位置，成为仅次于企业自筹资金的一个主要来源（国家统计局，1998、1999）。